

好项目要给社会和民间资本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答记者问



徐绍史(右)出席记者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介绍了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并就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增强投资效率和发改委自身的改革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宏观调控要有新作为

经济步入新常态,宏观调控会有什么新思路和新举措?对此,徐绍史说,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艰巨的改革任务,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宏观调控在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

他说,2013年我国创新宏观调控,实施区间管理,2014年又创新推出定向调控和结构性调控,对经济平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部门要加强对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和政策措施的预研储备,还要探索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徐绍史认为,在积极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上,更灵活地应用规划、计划、消费、投资、产业、价格、区域政策,加强这些调控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多种目标、多项政策、多方面的改革能够协调、联动、平衡。

他说,宏观调控必须调适理念、调适政策、调适评价分析方法。对经济波动要保持战略定力,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加强微调、预调,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对政策措施做了一个“工具箱”,区分经济平稳增长、经济



济波动、经济趋势性下滑三种情况,准备相应的政策措施。

徐绍史说,现在统计数据不匹配的现象很多,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情况,需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及多种评价方法来分析经济运行情况,探寻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新规律。

投资应精准有效

针对当前加大投资力度是否意味着“强刺激”的问题,徐绍史回应说,经济“三驾马车”中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打好投资组合拳要精准投资,不存在“强刺激”。

徐绍史认为,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切实提高投资效率,要解决好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三个重大问题。

他说,现在的投资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而是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主要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政府要用好自有资金,同时也要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政府要通过购买服务、股权投资、共同投资来加强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政府必须把一些现金流比较充裕又有稳定回报预期的好项目拿出来,让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来做。”徐绍史说,“我们与财政部商量,设立了新兴产业创新引导基金和制造业支持基金,以改变我们投资的方式,用预算内投资来撬动社会投资。”

发改委要自我革命

“发改委要做好自身改革,包括审批制度改革、核准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等四个方面。”徐绍

史说,要动真碰硬、自我革命,这样才可能推进和深化改革。

他说,发改委已经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到76%。2014年草拟了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国务院已经通过并颁发。核准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力度也比较大。

今年发改委还会进一步加强价格改革力度。“我们还在酝酿药价改革和电价改革。这些改革推出后,准备公布政府定价目录,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徐绍史说。

徐绍史还介绍,为防止腐败,发改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集中教育,同时深挖原因,加强制度建设,对各个风险点进行分析和排查。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审批公开,做到透明审批,同时加大管审批、管钱、管物等关键岗位上的干部轮岗交流力度,做好干部监管。(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追热点

如何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代表建议——

企业提供平台 让人人成为“创客”

□ 本报记者 李占江 张春晓 贾瑞君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让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山东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轮值总裁周云杰关于企业提供平台、人人可成“创客”的观点,让人眼前一亮。

“之前,人们想到海尔,想到的是冰箱,洗衣机等,现在,海尔已经转型成为一个一流的大众创业平台。”在现场,周云杰手里拿的一个“小球”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我手里这个小球实际上是一个无屏的网络电视,它完全是开放式创新的作品。”周云杰介绍,这个产品源于海尔一个85后的员工在网上和用户交流的时候,发现了两类用户的抱怨,一类是孕妇反映坐着看电视不舒服,希望能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看电视。另一类是妈妈反映小孩看电视伤眼睛,希望有可以替代传统电视的产品。因此,这个员工把创意发到海尔开放式创新平台上,结果吸引了全球无数资源参与。最后经过用户的投票,选择了硅谷创业者的解决方案,采用美国德州仪器提供的高性能光机,利用武汉光谷的生产基地,开发出了这个无屏网络电视,上市以后引起用户的抢购。

“我们推动大众创业的主要思路,是将企业由传统的管控组织塑造成新型的创业平台,让员工成为平台上的创业者,即‘创客’,从被动执行转变为主动为用户创造价值。不仅如此,企业外部有意向创业的人也可以成为‘创客’,在海尔的‘创客公地’上以小微公司的形式自主创新。”周云杰说。

据介绍,海尔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支持创业者成立小微公司。一方面,小微公司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享有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充分发挥主体性。另一方面,海尔与小微公司具有合作关系,不仅为小微公司提供创业所需的资源,而且会在产品研发、设计、营销、制造等过程中,与小微公司进行沟通,提供帮助。再就是为打造适合创业者及小微公司生长的土壤,海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创业平台生态圈的打造上,为小微公司提供设计、制造、销售等方面的必要支持,以及对外部资源,吸纳外部人才等配套服务。

“创客”创业的阶段不同,如何在一个平台上都能健康发展呢?周云杰告诉记者,为了适应不同创业阶段的特点,海尔设计了资金支持机制和薪酬机制。截至2015年2月,海尔集团已支持内部创业人员成立212家小微公司。创业项目涉及家电、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类别,以及物流、商务、文化等服务领域。另外,在海尔创客公地,已经诞生470个项目,汇聚1322家风投,孵化和孕育着2000多家创客小微公司。海尔创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已为全社会提供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

在周云杰看来,这种“创客”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他建议,应建设国家级的创客实验基地,提供配套政策,建立由市场主导、风投参与,企业孵化的创业产业化生态系统,真正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变为现实,带动中国新一轮经济“破茧成蝶”。(本报北京3月5日电)

两会现场

出租车改革明确总体管控

“专车”指导意见将尽快出台

综合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5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采访时透露,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或将于今年上半年出台。指导意见将尽力协调好出租车使用者、经营者及互联网经营者,找到三者的最大公约数,尽快让我国出租车管理走上正常轨道。

杨传堂说,出租车的总体管理由各城市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具有指导责任;交通部对“专车”等互联网打车软件的态度是“鼓励创新、规范管理”。“到目前为止,各有关省市区,都采取了措施,落实的情况是好的。”

杨传堂说,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此前已经进行了三轮深入调研,并形成了大体轮廓;两会后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第四轮调研,尽快出台改革指导意见。

他说,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将明确四个原则:出租车的定位不是公共交通;出租车需采取总体管控,不能太多或太少;出租车采取价格管控;司机和经营者都能得到合理报酬。但他未提及“份子钱”是否将改革。

“各个城市差异很大,出租车改革有的城市早,有的城市晚,有的是管理,有的是放开。”杨传堂说,所有城市都应该努力让出租车管理走上正常轨道。

杨传堂表示,正在制定指导意见,促进网络约租车,也就是“专车”的规范发展,争取尽快出台。

“据我所知,很多人还是喜欢用打车软件叫车的,比较方便,效率也更高。可以这么说,当前出现的‘专车’服务新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具有积极作用。”杨传堂说,“专车”服务在驾驶员管理、服务质量评价等方面的先进管理手段,值得传统出租车行业借鉴。我们既要鼓励移动互联网与运输行业的融合创新,满足人们出行的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也要遵循市场规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杨传堂同时表示,当前“专车”服务也存在私家车非法营运、平台主体责任不明确、乘客安全和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造成出租车市场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俞敏洪：通过网络 达到教育资源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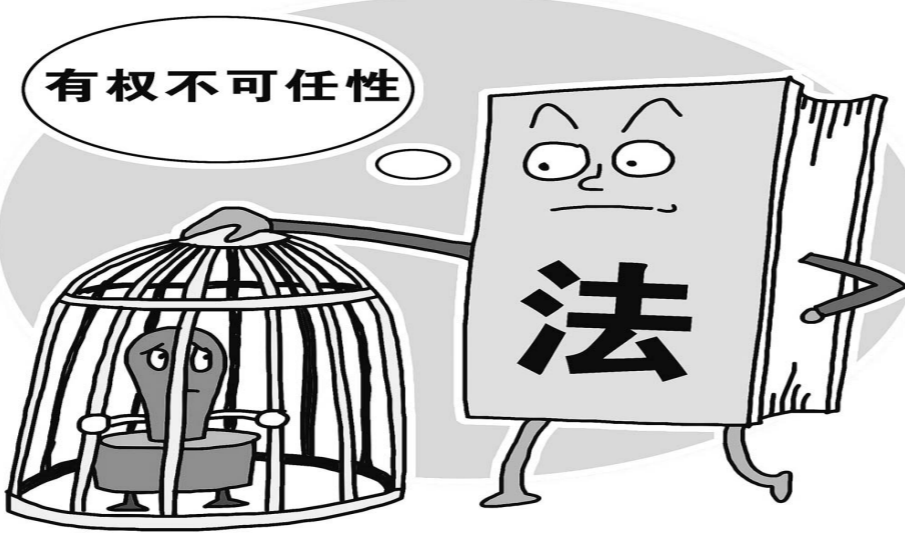
□ 本报记者 魏然 赵琳 江昊鹏

“去年我们在北京延庆县做了一个试点,通过互联网让当地的学生实现和优秀教师面对面上课,大概累计40个小时,学生的平均高考分数提高了5分以上,那个县一本的学生一年增加了50个,效果非常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通过在线视频教学系统直接将优秀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对接给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方式,将变得更有切实可行,所覆盖的区域也将更多,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未来的教育将不存在地面教育和线上教育之分,虽然这实现起来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无疑是实现教育资源均衡的有效途径。因此他建议,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搭建出切实可行的信息化平台,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快实现区域、城乡、校际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交流,逐步消除教育鸿沟,促进教育公平。(本报北京3月5日电)

“有权不可任性”引发代表热议 权力不任性必须受约束



□ CFP 供图

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简政放权时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有权不可任性”正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两会视点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贾瑞君 李占江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简政放权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上半句出自《道德经》,下半句借用网络流行语的混搭体语句,在现场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场外也被频频引用。

让企业不求人也能好办事

“这个提法很新颖,权力不可任性,那就必须受到约束。”全国人大代表、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完报告后自己一直在思考这句话,这句话所指向的,正是一些掌权者“不作为、乱作为,吃拿卡要,庸懒散”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威海市长张惠,则对曾经“任性”的行政审批深有感触。“原来建设工程审批是‘万里长征’,链条式审批,在企业里,张三负责跑建设部门,李四负责跑国土部门,各有分工。我们在改革中,推行建设工程模块化审批,把长链条改成五个模块,串联变并联,把原来需要几百天干完的事儿,理论上压缩到28天。”张惠说,现在反过来需要企业适应政府的这种改革,政府部门就深入企业去培训,一家家告诉他们怎么做,“我们本届政府提出‘让企业不求人也能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不需

要企业跟政府搞关系了。”

张惠告诉记者,威海市政府倡导能在网上办理的事情就网上办,能在政务大厅办的就在大厅办,原则上不允许再去部门办事。在审批环节,原来每个科室都有审批权力,现在把权力集中,跟审批有关的全部进入大厅。在威海智慧政务平台威海市民网,能办1000多项事项,最重要的是市、县、镇三级联网架构,比如在镇上一项事情,需要市里批,市里直接在网上办理,“没有前置审批的事项基本上一天就能办成。”

中介不能拖简放权“后腿”

“我们在临沂商城的2万多经营业主,原来都是个体户,不到半年时间,注册公司2000多家,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简放权激发出的市场活力。”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士岭说。

张惠认为,现在地方政府在简放权方面已经做得很努力了,反而是中介,是整个审批链条上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清理规范中介服务”。

“审批链条上,市级需要中介的是50项,其中在相应领域只有一个中介的有13项,甚至这方面的中介全省只有一个,有的还不在本地,一个领域有三个中介算多了。”张惠说。

没有竞争,就意味着垄断。“有些中介是部门分出来的事业单位,企业要办相应的事情必须找它。放眼全国,审批环节这样的中介还不少。”张惠感慨,“这一问题的解

决,光靠地方政府很难实现,因为有些中介的成立需要很多专家,再由国家和省里来批,省市没有权力去批这些中介,因此必须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国家在这方面要大下力气。”

对修改《立法法》充满期待

张光峰认为,现在已经从解决“审批多”转向“审批难”的阶段。“改革到了深水区,触动的是部门核心利益,有些权力部门不愿拿出来。”

张光峰告诉记者,政府不能任性使用权力,任性维护权力,就要做到四个方面:必须依法用权,依法行政,敢于担当,接受监督。在监督方面,去年滨州做了一件让一些政府部门不好受的事情:对全市105个市直单位和各县区直部门及乡镇办,开展了一次负面表现测评,在媒体上公布了不满意度列前15名的单位,这些单位的“一把手”也被约谈。“从过去的满意度测评变为不满意度测评,让群众来挑不足,说意见,政府部门的作为接受群众的监督。”张光峰说。

“权力不可任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德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说,她对这次全国人大代会上即将审议的《立法法》修改草案充满期待,“草案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这是此次立法修改的亮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条款,这一条一旦写入,今后政府想通过红头文件作出相关规定,行不通了。”(本报北京3月5日电)

简政放权 进入2.0时代

□ 本报记者 魏然 赵琳 江昊鹏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李克强总理的这句话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点睛之笔。不少政协委员认为,这回应了公众对简政放权的期待。

报告中“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地方政府对应该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等内容,意味着简政放权将从单纯削减审批数量,向行政权力调整纵深发展。

“真正由无所不包而又越位、缺位、不到位的‘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有为的政府,必须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致公党重庆市副主委、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丁时勇委员认为,本届政府把加快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截至去年底国务院已分9批取消和下放了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意味着本届政府“在任期内削减1700多项审批权三分之一”的承诺已经提前兑现。

丁时勇同时提出,虽然行政审批事项的大幅度取消和下放,但“审批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部门和地方对一些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的相对较少,致使不少企业和民众对简放权的感受并不明显;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审批事项明减暗增、权责不匹配、基层承接不住等问题。

他建议该由基层政府管理的事项一律下放,在简放权的基础上,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防止法外设权。需通过事前控制进行审批监管的事项,应通过法定程序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事项则应尽量切换为行政服务类事项或事后监管类的备案登记事项。

“现在在很多地方进行的审批权下放,一口受理、限时办理、透明办理等,都是就审批言审批,主要在形式和操作层面进行改革,没有触及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根本。”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广西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钱学明委员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简放权,不是简单的放而不管,而是要有相应的组织接过政府下放的管理职能。

“现在我们在市场监管方面尽管设置了很多机构,但是问题还是很突出,老百姓还是不满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这就需要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根本方向是行政权力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其实有些职能完全可以交给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现在这类组织的功能比较差,是因为政府把权力握得太紧了,没有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比如在政府做好公益性教育、医疗的同时,能否放开这些领域的服务业市场,放权之后社会资本是有积极性的,“有需求,有资本,重要的是放开服务业市场”。(本报北京3月5日电)